



第一本中文版 《共产党宣言》诞生记

□ 何建明

1918年的岁末，寒风凛冽的黄浦江码头上，一位离“家”已经整16年的青年，怀揣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毕业证书和两只大布包，踏上了外滩的十字街头。这个青年叫李书诗，号汉俊，后来我们在中共一大代表的名单上所看到的“李汉俊”就是他。

他从日本带回的两只布包中没有一本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书，尽是英、德、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刊。

李汉俊经人介绍，住进了上海渔阳里。8个月后，陈独秀便来此，开始了他和战友们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这里也成为中共创建早期的办公地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筹备地。

1920年1月初，这一年的上海格外寒冷，雪花覆盖了黄浦江两岸。

“我感受到了你们身边，如同靠在熊熊燃烧着的熔炉边一样，格外温暖！”陈独秀是个情绪始终激荡的人，他坐下来就开始与李汉俊、陈望道等商量一件大事。

“俄国革命已经胜利了。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政党。这次在离开北平时，我与李大钊先生就讨论过这事。此行到上海来，就是想与诸君一起完成此大业！”陈独秀明确地亮出了自己的任务与观点。

“成立政党，必须先有思想上的准备啊！现在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和传播非常混乱，应当有个权威的阵地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出去。”陈望道说。

李汉俊比陈望道大一岁，他说：“我同意望道弟的意见。建党必须先得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透、研究好后，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所以我建议：一是可以仿效日本政党的做法，先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且尽快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

陈独秀频频点头，说：“你们的意见极是。组建政党必须理论开道才是！”边说边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他突然停下道：“这样，我们第一件事，是尽快把《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然后想法在汉俊你们的《星期评论》上发表。第二件事是马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作准备！还有，我也尽快把《新青年》从北京再搬回上海，要让它成为新的政党的机关报……”

“完全同意仲甫先生的意见，我们马上分头行动！”李汉俊和陈望道异口同声表示赞同。“仲甫”是陈独

秀的字号，早期党内的同志都这样称呼他。

后来，李汉俊把自己从日本带回的一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和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交给了陈望道。“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必须字字翻译准确，此事非望道莫属！”陈独秀紧握陈望道的手，深情地道：“拜托了！”末后又说：“望道，你最好别在上海，躲到哪个世外桃源去把它突击翻译出来吧！”

陈望道苦笑道：“那只能回我家义乌了！那儿就是你们想找我也不容易找得到呢！”

“太好了！”李汉俊兴奋地说，“我随时把《星期评论》的版面给你腾出来。”

陈独秀马上摆摆手：“可不是仅仅在你的《星期评论》上发，还应该出单行本！让所有中国革命者和进步的青年们人手一册！”

李汉俊和陈望道相视一笑，这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同路者的信念。

1920年的早春，陈望道带着两本外文版《共产党宣言》，冒着寒风、踩着雪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浙东小山村分水塘。

为了安静，陈望道就在自己家的柴屋里搁了一张桌子，开始了他的翻译。

“融儿，这里太冷，搬到堂屋的阁楼去写吧！”母亲一边唤着陈望道的乳名，一边给他的双腿盖上一件厚棉衣。

“不妨，娘。这里安静，我需要安静！”陈望道埋头继续翻着那本母亲看不懂的“洋文书”……

翻译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枯燥乏味的，但陈望道不一样。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如同黑夜笼罩着的大山之中燃起的一把火炬，照得陈望道眼里一片光明：原来，世界上早已有了拯救人类和中华民族的“良方”呀！

你听，其声如擂鼓，振聋发聩——“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游荡。”

你听，其声如擂鼓，让人清晰明了——“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这就是世界的未来！中国的未来！

陈望道一次又一次激动了！激动的时候，他便高声地用英语或用日语诵读《共产党宣言》……他的声音在故乡的那片山谷间回荡。

古朴的山乡让陈望道得以全神贯注地进行着自己的翻译，神往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字中所呈现出的世界风云。

陈望道一边翻译，一边细细地领会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并且更加坚信它就是摆脱旧世界枷锁的真理之光！于是，这位义马青年忘掉了身边所有的一切，唯有笔尖在纸张上“沙沙”作响……

这时，母亲拿着饭碗和几只粽子，以及一碟甜甜的红糖进了屋，见儿子埋头在纸上写字，不舍打扰，便悄悄地退了出去，把门轻轻掩上。

江南的早春，时有阴雨。雨水从屋檐滴下，恰好落在柴房的小半边屋顶上，“滴答滴答”的水声并不小，然而完全沉浸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激情与文献译著之中的陈望道，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屋外的雨天，只是感到饥肠辘辘时，才下意识地伸手抓起桌上的粽子，用手扒拉着解开粽叶，然后习惯性地往碟子里蘸点红糖，再塞进嘴里。咀嚼着那母亲专门为他包的香喷喷的粽子，他觉得很润、很甜，就这样边吃边译……

“融儿，红糖够不够呀？”这是母亲的声音，她怕打扰儿子，就站在门外问道。

“够了够了……蛮甜的了！”儿子在里边传出话来。

快到傍晚时分，母亲轻声轻脚地推开柴门，去给儿子收拾碗筷。嗯？碟子里的红糖咋没了？母亲觉得奇怪，便看看仍在埋头写字的儿子，越看越不对劲：“你的嘴上咋弄得这么黑呀？”

“啥？”陈望道这时才抬起头来。“哎呀！尽是墨哪……”母亲叫了起来，“你咋把墨弄到嘴里去了嘛？”

陈望道顺手往嘴边一抹，再一看，便哈哈大笑起来：“娘，是我刚才把墨汁当成红糖蘸着吃了……”

“看你！”母亲心疼地嗅了一眼儿子，嘀咕道，“你啊，一有书看，有字写，就啥都不在乎了！那墨跟糖能一样吗？我看，都是这书把你搞糊涂了。”

儿子笑了，说：“娘，我没糊涂，你的粽子和红糖很甜，我这书也很甜呢！”

陈望道完成翻译之后，立即返回上海，将翻译的中文稿交给了李汉俊和陈独秀。陈独秀对陈望道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大加赞赏，但是说到出版，这位囊中羞涩的大教授就有些为难了。

李汉俊刚回国就投身宣传马克思主义，所办的《星期评论》杂志本来就是自己和朋友掏钱的赔本买卖，怎能再血本付出。陈望道苦干了几个月的“义务劳动”，也没人再

好意思让他“出血”。

已经几个月没薪水的大教授陈独秀无奈地双手一摊，耸耸肩，自嘲道：秀才想打仗，没钱买枪炮……实在是愁煞人啊！

就在这个时候，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派来一位帮助中国组建共产党的代表维经斯基。

维经斯基第一站到的是北京。他首先找到了正在北大图书馆任职的李大钊，向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李大钊则向维经斯基介绍中国的革命形势和五四运动的过程与性质，同时又把邓中夏等进步学生介绍给维经斯基。

随后维经斯基在李大钊的介绍下，来到上海，迫不及待地去见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

“我们现在是要啥没啥，除了一张嘴和一支笔外……”陈独秀对维经斯基的到来十分高兴，见了客人，他的直性子就上来了，因为此时他正发愁没钱出版《共产党宣言》。

“这个我们支持！”维经斯基立即拿出1000元大洋的银票交给陈独秀。

陈独秀接过银票，大喜。他随即交代李汉俊：“找个进步的出版社，抓紧印！”

很快，第一本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上海诞生了！它如一束迷雾中透出的阳光，迅速驱散了那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者头上笼罩的阴霾……

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即文学家茅盾）、邵力子等。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

之后，李汉俊等根据陈独秀的指示，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名义，开始向北京、长沙、武汉、山东等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写信，要求建立起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加紧筹建“中国共产党”。

“到底叫‘社会党’还是……”陈独秀在关于党的名称上有些拿不准，便与北平的李大钊商量。

“叫‘共产党’！”李大钊毫不犹豫地。

“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就是由“北李南陈”确定下来的。

下面的许多事我们都知道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地址是上海法租界望平街106号（现兴业路76号），该房子是李汉俊和他哥哥李书成的寓所，人称“李公馆”。

中国的伟大历史就从这里掀开了新的一页。

（摘自2019年7月1日《解放军报》，原标题为《初心如此壮丽》）

1934年2月，红二十八军在徐海东

的率领下开进安徽省金寨葛藤山地区。部队刚刚在葛藤山下落脚，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师第一六一旅就向红军追来。徐海东了解到：国民党第五十四师代理师长叫刘书春，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但由于没有“后台”，所以，混得个师长还是个“代理”的。为了争取得到上司的提拔，刘书春对红军作战很“卖力”。

徐海东掌握了刘书春的心理，与红八十二师师长梁从学、红八十四师师长黄绪南详细研究了形势后，决定避免与敌军主力正面作战，先吃掉敌人部分兵力。

4月1日拂晓，徐海东命红八十四师一营坚守阵地，正面压制敌人火力，同时派出红八十二师一营和二营，向葛藤山西南边簸石沟佯动，吸引敌军主力离开。果然，当敌大部队看到山梁上出现一支红军队伍时，立刻尾随而来，对着石家沟的山头发起了猛烈攻击。见敌人上钩，徐海东当即命令部队“快速上山，待会儿更要迅速下山”。一时间，红军战士们很快就抢占了山顶。徐海东命令一个排用火力压制住敌人登山的速度，其他人则顺着一条山沟快速撤到山下。

敌人只看到红军上山，便误认为红二十八军的主力就在山顶，于是将全部兵力和火力对准山头。刘书春虽然知道徐海海外号“徐老虎”，但认为从前与徐海东交手的国民党将领不能与自己相提并论，此刻见红军火力稀疏，以为红军抵抗不住，于是命令部队急救。

正当刘书春得意之际，突然炮声、枪声从左右两侧传来。原来，从山沟撤下来的红八十二师两个营协同红八十四师二营、三营则从东面迂回至敌人侧后方，配合山头的一个排和隐藏在葛藤山东南山脊的红八十四师一营同时出击。敌军突然之间遭受到三面夹击，无法弄清红军的兵力究竟有多少，顿时四处逃窜。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敌人的两个团只跑掉了1个营，刘书春被活捉。

官同生：真心英雄 不怕牺牲

□ 白田田

官同生，出生于1948年，祁东县人。他于197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参加公安工作，历任祁东县公安局城关镇派出所、刑侦股民警。

在生前日记中，官同生就立志“争做人们所欢迎、爱戴的一名人民警察”。他先后8次奋勇救火，6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81年5月27日，7名犯罪分子携带从江西南城县武装部枪械库盗窃的枪支弹药，窜至祁东县，住进汽车站旅社。当晚，祁东县公安局接到汽车站旅社服务员报警后，迅速组织围捕，官同生主动请战。执行任务途中，官同生对

徐海东：『我是青山军事大学』毕业的

□ 胡遵远

战斗结束后，刘书春被押到徐海东面前，还不知趣地问：“敢问徐将军是保定军校的？还是黄埔军校的？”徐海东风趣地回答：“我既没听过保定军校的课，也没进过黄埔军校的门，我是青山军事大学毕业的。”刘书春不解地问：“徐将军，敝人知识浅薄，不知这青山军事大学在哪儿？”

徐海东手指着背后的山岭说：“喏，这就是青山军事大学！这方圆几千里的大别山，处处都是红军的军事大学！”（摘自2019年9月12日《人民政协报》）



同事说：“今晚的任务不同往常，对我们是一个考验，要有流血牺牲的准备……”

5月28日凌晨1时40分，17名民警包围了汽车站旅社的四号房和七号房，随后抓捕行动展开。在四号房，官同生与罪犯进行搏斗时，不幸被罪犯开枪击穿右腿股动脉。子弹穿过腹部，进入腰背，鲜血喷涌。官同生以坚强的毅力打掉了罪犯的枪支，将罪犯压在身下，直到战友将罪犯抓获。最终，7名罪犯全部被生擒。官同生因流血过多，当场壮烈牺牲，年仅33岁。

1981年6月16日，官同生被公安部追授为一级英雄模范。

（摘自2019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

解，内行人讲内行话，演员们听了都口服心服。

周恩来很赞赏陈白露的扮演者雷南，说“我给你打75分”。贺龙指着雷南说：“她还是有点拘束，她要不是共产党的话，也许更放得开些。”周恩来说：“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是共产党员，应该演得更好些。”话音一落，贺龙和大家都笑了。

早年参加过孩子剧团的张莺，在剧中饰演陈妈妈，周恩来见到她非常高兴，他对张莺说：“你和你们的邓妈妈找了你几年，原来你在这里。”他拉着张莺照了一张相，又从身上的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递给张莺，说：“你写几句话，我回去带给你们邓妈妈。”

周恩来又亲切地问了几个导演的家庭出身，结果，第一个回答是地主，第二个回答也是地主，第三个回答还是资本家兼地主，引起全场一阵哄笑。周恩来坦诚地说：“我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背叛家庭闹革命，家庭出身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是身不由己的，但不妨碍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民族立功。”

在周恩来面前，大家无拘无束，谈笑风生，如同接待一位最尊敬的长者和最亲密的朋友。

和文工团员跳舞

为了详细了解文工团团员们的生活情况，周恩来还特意来到大家的宿舍。当时文工团的红楼宿舍刚整修不久，他看了很满意，说：“你们的宿舍比北京有些剧团还好些。”

当走到团里的小礼堂时，周恩来问李庆升：“你就不让我和这些年轻的演员们跳支舞吗？”于是，乐队奏起了音乐。

看见周恩来和大家跳得兴高采烈，罗然也想跳舞，但没有舞伴，于是便坐在乐队旁，看大家跳舞。谁知她刚坐下不久，就看见周总理走了过来，邀请自己跳舞。顿时，罗然感到胸中涌出一股暖流，心咚咚跳个不停。

周恩来拉着罗然的手，一边跳舞一边亲切地问：“小鬼，你叫什么名字？”“总理，我叫罗然。”第一次和周恩来跳舞，罗然显得十分紧张。

周恩来又问：“你是哪个地方的人？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

罗然回答：“我是四川广元宝轮镇的人，1950年抗美援朝时，国家号召知识青年参军，保家卫国，我就报名参军了。”罗然明显感到自己手心出了汗。

“你的钢琴弹得不错嘛！在哪里学的？”

“我从四川省艺专参军，到北平军文工团，后转业到西南团工委青年文工团，西南大区撤销后，当时重庆军文工团需要一个弹钢琴的人，伴奏京剧功和芭蕾舞的基本功训练，因为我是学钢琴的，所以团里把我调来了。”

“你成家了吗？爱人在哪里工作？”周恩来亲切地问。

看到周恩来和蔼可亲，像一个慈祥的长辈，罗然慢慢放松了下来，答道：“成家了，爱人也是军人，在四川军区组织部工作。”

“见到你爱人，记着代我向他问好！”周恩来边跳边说。

和罗然跳完一支曲子后，周恩来又去邀别的女同志跳。当舞会快结束时，文工团中还有一位女同志没有和周恩来共舞，周恩来发现后，便要乐队再奏一曲，上前邀请那位女同志跳。细微之处充分体现出周恩来的体贴周到。

（摘自2019年第7期《党史纵览》）

周总理来到我们文工团

□ 何广华 何明圆

这是一张62年前的照片，照片上的周恩来面带微笑，用手指着当时重庆市文工团的团长李庆升，亲切地与之交谈。坐在后三排的那个长相甜美、身材高挑的姑娘，名叫罗然，她正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周恩来，聆听总理的教诲。

“这张照片拍于1957年，那时我才27岁，风华正茂。当时，周总理和贺老总出访欧亚11国后回国，路过重庆作短暂休息，专门来文工团观看正在上演的《日出》，并亲切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62年来，罗然一直将这张照片视为珍宝，从不轻易示人。

拍板剧本《四十年的愿望》

1953年，重庆市文工团（1958年1月改名为市话剧团）按照市委的指示，创作了反映成渝铁路建设的话剧《四十年的愿望》。时任市委宣传部部长的任白戈为这个剧本的创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剧本由团长李庆升执笔，初稿出来后，市委便召开常委会讨论，剧作者全部列席市委常委会参加讨论。

话剧《四十年的愿望》在重庆演出时，被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著名导演吴雪看中，便调创作组去北京修改剧本。在中国作协书记光未然的支持下，经过数月奋战，剧本终于定稿，由洪深导演搬上了话剧舞台，并通过了时任文化部部长周扬的审查。

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的贺龙得知此事后，匆匆赶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他虽然没有看过修改后的剧本，但他看过在重庆的演出，对该剧还保留着重庆演出时的印象。贺龙认为戏不成熟，应该暂停上演，并打算请中央领导



看后再定夺。这下青艺着了慌，演出宣传马上停止，票也不敢卖了。

贺龙的动作也很快，第二天晚上便请来了周恩来，还有时任炮兵司令员陈锡联、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及各方面的负责人。戏演完后，周恩来立即主持会议，并首先表态，认为这个戏写的是铁路工人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了西南人民修建成渝铁路40年愿望的事迹，表达了建设祖国的热情，方向正确，应该肯定。

随后，周恩来又让大家提出缺点好让作者修改，并首先指出剧中应有军代表出场，军代表是负责干部，他不出场不合适；接着又询问大家最后通车的尾声要不要保留？他认为尾声还是需要的，因为人民要看到愿望的实现才满足。周恩来的意见既中肯又具体，令全体创作人员深受感动。

当晚，按周恩来的意见，主创人员将剧本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军代表上场的剧情。在周恩来的关心指导下，《四十

